

略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诗歌艺术风格比较

姜东 姜珊

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

中唐历史上，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生涯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一同参加王叔文变革运动，意气风发之时却遭小人排挤，从此被贬远方。柳宗元先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被贬为柳州刺史；而刘禹锡则先做朗州司马，后又做连州刺史。同样的远离中心地带，报国的雄心壮志如石沉大海，难以再一展雄才，柳宗元更是客死柳州，今生再未得机会重返长安，而刘禹锡再登长安时，也是物是人非，风物不同……

在中唐时期，有两大文学流派，一个是以“韩孟”（即韩愈与孟郊）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在诗歌上主张奇崛险怪；另一个是以“元白”（即元稹与白居易）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主张诗歌语言浅近、贴近生活。柳宗元与刘禹锡却以其个性化诗歌艺术特色，游离于两大文学流派之外，自成风格，显示出其出人的文学素养与独到的创新能力。从春风得意的政治巅峰，一下被贬至荒无人烟的边远之地，昔日盛聚在长安天子脚下的文人团体如今也已是七零八落。前后二十余年的贬谪经历，促成了刘柳二人诗歌风格的转型与成熟，柳宗元的诗歌显露出清峻冷峭的艺术风格，而刘禹锡的诗歌则生发出清丽沉雄的艺术气质。本文拟从地方接受和个性表达角度比较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诗歌艺术风格。

一、柳宗元清峻冷峭

在贬谪时期，柳宗元的情感经历了忧伤到绝望的转折，其诗歌发展也因此具有从永州到柳州的地方跨越性，由清丽转向奇峻。在永州阶段，子厚诗歌多以五言古诗为主，气势凝练古穆，风景清秀奇丽，其传颂千古的名篇《江雪》就是在此期间写作而成的。对地方山水的接受，大体程度上，处于物用的阶段，把自然山水作为自我排解抑郁情绪的工具。

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诗歌对于风景的描摹，多以骀荡起伏的笔法，在物象的前后突转上渗透诗人身心所遭受的巨大落差，不难发现，诗人即使描写宏大庞伟的高山远水，也是以其浩大的声势自壮其威，在这种强大的震撼力消殆之后，诗人的心绪也即刻被围拢而来的凄清幽静所包围，笔触所及，也尽是清幽之景、忧愁之情。此时期的作品，诗人多用清冷幽静的语汇去描摹山水，如“寒”、“凄”、“幽”，以表达诗人深沉的失落与内心的孤独。

例如此期间的《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有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诗人对于“秋气”、“林影”、“羁禽”、“寒藻”的运用是十分娴熟而自然的，因为这些散发着寒气的凄然物象符合被贬官至此的柳宗元的内心真实情感。一句“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直抒胸臆，将情感推至高峰，解释了前八句孤独徘徊的直接内心缘由，既是承接前情，也是复唱悲声，凝寒中的悲情从景物中跳脱出来，直观地击打在读者内心。后两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在迷失自我的境遇中消解自我

孤独，没有选择承接前两句的情感直接外向宣泄，而是选择将隐含的情感继续内化，使得诗人的主观悲情在含而不尽吐的连续循环过程中重复累积，将情感推向厚重的层面，这也是柳子厚的诗歌具有内生化悲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柳宗元在永州的诗歌，还是通过借助自然风光抒发自我悲情，把自然作为消解孤独的一种解脱方式，当他再次被贬至柳州时，此刻的诗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面对再次的迁谪，诗人将自己沉郁多年的悲情向外蔓延开来，使得他身边周遭的一切自然山水皆着悲色，在世人的主观世界里扭曲变形，不仅尽失原本的清新秀丽，甚至变得奇崛阴森。如他在初到柳州所作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便开这一特殊时期的艺术风格的先声：“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其中“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历来为人所称道，在罗小芳的《图形-背景分离视域下的柳宗元诗歌意境分析》一文中讲道：“颌联、颈联中出现的‘芙蓉水’、‘薜荔墙’、‘岭树’、‘江流’等，便是浮凸于茫茫苍苍、并无具象的背景之上的图形，二者不以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图形与背景就构成了拓扑空间关系。”此时的山水，是诗人本身生命主体意识的外化表现物，诗人的价值长期处于被埋没的阶段，也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自然景物的本体化转移来变相抒发己志，吟咏悲声。

二、刘禹锡清丽沉雄

与知己好友柳宗元不同，刘禹锡在把自己这段贬谪生涯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显现出了乐天豪雄的气概，具有巍峨挺拔的丈夫气质，虽不似李白一般将情感洪流一口气喷涌而出，但却自有胸襟气度，如高山般峨峨不倒。可以说，从情感气度上，刘禹锡的这种自我派遣同时又不堕志向的超品高格，无疑在精神魅力以及推广意义上，要明显胜于柳宗元。

刘梦得的诗歌清丽沉雄，主要表现在他对当地民歌等艺术形式的继承以及他个人情感志趣的高拔。对于当地地方风土人情和民俗民事，刘禹锡选择敞开心怀去全面了解，在去芜存菁的基础上，他对连州、朗州这几处他贬谪所居之地的风俗加以吸收，并在诗歌中加以运用。刘禹锡的诗歌以五言古体和近体格律诗为主，在前后两个贬谪地，主体情感并没有过度强烈的变化，既不陷于绝望境地，也不一味地强抒己志。在抒写抱负胸怀或悲愤之情时，诗人多进行沉俊而深刻的抒怀咏志，而这种抒怀不只停留在厚度，即在内容上与前人又有所不同。

诗人的诗歌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到：“陌生化的实质在于不断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采用创造性的独特方式，使人们面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有新的发现。”要想将陌生化运用得

得心应手, 首先就要做到中心情境边缘化或边缘情境中心化。试看刘禹锡历来为人所重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去, 便引诗情到碧霄。”宋玉在《九辩》中点明: “悲哉, 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惊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连宋代著名散文家欧阳修也在《秋声赋》中写下: “盖夫秋之为状也: 其色惨淡, 烟霏云敛; 其容清明, 天高日晶; 其气栗冽, 砭人肌骨; 其意萧条, 山川寂寥; 故其为声也, 凄凄切切, 呼号愤发。”而刘禹锡却一改历来悲秋的传统基调, 赋予秋天以极强的生命力量, 一如作者本人身处百物凋零的迁谪之处, 无人相问, 无人相忆, 但自有一股顽强而蓬勃的生命意志在以特有的形式彰显着, 这种豪迈气概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潇洒磊落的丈夫气节, 这也是屡见于梦得诗作中的沉雄之气, 也正是因此, 白居易曾感叹: “彭城刘梦得, 诗豪者也, 其锋森然, 少敢当者。”这种陌生化的艺术魅力, 同样也体现在刘禹锡的怀古诗、哲理诗中, 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蜀先帝庙》、《石头城》等等。

在刘禹锡的民歌乐府诗歌中, 则更多的体现了与连州、朗州等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交相融合。诗人曾有多篇组诗, 其中以《竹枝词》、《浪淘沙》等诗歌最为成功, 其中《竹枝词》的艺术手法和声律运用, 更是开词令之先河, 为后世词这一类问题的问世, 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和创作资源。这里举其一首《竹枝词》: “白帝城头春草生, 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 北人陌上动乡情。”这首诗前两句严格按照格律诗的声律平仄, 因而显得典雅含蓄, 而后两句却突然打破格律限制, 使用民歌的吟唱节奏, 以“南人”、“北人”一个唱一个听的画面剪辑模式, 既体现了当地人民歌以抒情的有趣交流方式, 更是借此道出了对故乡旧人的深切思念。前后四句, 风格在大同中又各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 四幅画面连续转换, 同构成整首诗歌的流动美感。苏轼曾对这首诗予以极高评价, 说: “此奔轶绝尘, 不可追也。”

三、刘柳艺术风格比较

从地方接受角度去看待柳宗元与刘禹锡这一对中唐时期文坛上的双子星座, 柳宗元是“得其景, 忘其体, 化其情”, 而刘禹锡则是“景、体、情皆备”。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期曾写下数量可观的山水游记或山水诗歌, 在这类诗歌中, 诗人化情于物, 在山水中救赎自我, 或将自我中心情感附着在自然景色中, 总而言之, 永州和柳州的自然风光, 因为柳宗元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深沉情感的注入而得以生发灵气, 开始进入长安一带的诗人写作群体的审美视角。也因此, 柳宗元被视为继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之后的与韦应物齐名的中兴山水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后代的研究中, 也多将王、孟、柳、韦对比研究, 且大多数学者认为, 柳宗元诗歌的艺术成就略高于韦应物。但柳宗元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对于贬谪地区的一些民俗化的形式理论借鉴得不是很明显, 其风格的突变, 很大程度上是以情感为驱动力, 基于诗人自身情感的自然郁积或有意寻找消解孤独的替代品, 消解自我的同时构筑自我。

而与柳宗元对比, 刘禹锡在文学成就的广度上未必可及, 毕竟柳宗元是与韩愈同列在“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杰出散文家, 而刘禹锡在文章的成绩上, 或是不可与子厚争锋。但就其诗歌而论, 梦得诗歌以其雄健而深邃的笔力, 宽广而真实的情感维度在后世读者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明代杨慎极为推崇刘禹锡, 曾说: “元和以后,

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 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 不下百首矣。”在贬谪时期, 刘禹锡在诗歌的发展与成长上, 有效融合了当地的自然、传说、习俗、历史等多元化基础, 以隐形的诗性气度作支撑, 通达百家, 将咏史怀古、歌吟抒怀、民歌应用等多种形式, 更由于他喜爱运用民歌乐府诗体, 在格律上的限制就更加弱化, 手法的应用也就更加多元化, 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双向繁荣。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刘柳二人艺术风格, 此处选用二人第二次被贬之时, 即将分别之际的互相赠答之作, 柳宗元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 谁料翻为岭外行。波故道风烟在, 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 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 垂泪行行便濯缨。”与刘禹锡的《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 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 三黜名惭柳士师。归日并随回雁尽, 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 相望长吟有所思。”这两首诗作是本次赠答中的第一个轮回, 之后刘柳二人更是相互赠答两首, 从这开头诗作中, 我们便可看出这对难兄难弟在同样遭受贬谪后, 精神状态却有所差异, 对于客观事物的抒发以及诗歌的写作方式也就同样出现有所区别, 有所不同。

柳宗元的诗歌中, 洋溢着浓重的悲情, 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已是憔悴不堪, 近乎形容枯槁, 诗中以“憔悴”、“垂泪”、“遗墟”、“故道”等具有先入为主的悲观情绪的词来侧面增强了文字间的悲苦之情, 连用了“付波”和“翁仲”两个典故, 增强物是人非的沧桑荒凉, 颈联更是直叙时事, 直接写出二人身世飘零的原因, 满腹怨愤之情, 溢于言表。而反观刘禹锡诗歌, 在同样遭受不平待遇后, 诗人也一样怀着满腹忧愁与愤懑, 无处排解, 因此诗歌中也出现了“回雁”、“断猿”等凄凉意象, 增强再遭不公后的满腔幽情。但梦得与子厚不同之处在于, 他没有完全地使自我陷于绝望, 作为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 刘禹锡更懂得如何去转化和派遣心中抑郁, 这也是其诗歌具有长久以来的沉雄之气的理论原因和思想原因。同样面对挫折时, 他能够冲破枷锁性的束缚, 在精神维度上寻求自我价值的寻觅, 这是柳宗元所不能够企及的。在颌联中, 为酬答柳宗元而也用了“黄丞相”、“柳士师”两个典故, 但同是典故, 却足见诗人气度胸襟差异。刘禹锡使用的是两个饱受磨难最后却终成大业的两位名士, 意欲以此来劝慰友人重拾信心, 保存高远志向。可见, 刘禹锡除了有一份大丈夫的旷达胸襟外, 对于友人的关切和友谊的重视也同样令人动容, 足可谓诗人中的性情中人。

纵观柳宗元与刘禹锡的诗歌发展与个人经历, 其各有特点而具有共性, 笔者在此也无意作出孰优孰劣的一言判定。诗歌是个性化的精神气质产物, 二人之所以能在贬谪时期取得文学史性的成绩, 并且分别以独立且不可被复制的诗性气质和诗歌风骨, 区别于当代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四位文学家、两大流派, 自成体制, 自成风格, 不得不说是受益于贬谪时期的深度思考。无论是柳宗元的体悟山水, 在自然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肯定与升华; 还是刘禹锡的旷达沉雄, 以其个人理思从独特的视角切换历史社会和人生, 我们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并学习这种诗人气质的生活方式。正如《西方文论选》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 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 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 证明人们对他们的赞赏是应该的。”